

节 选

刊发家母回忆录《梦里当年》（暂定名，尚未正式出版）中记录父亲回忆录的社会反响的两节文字：

59. 和部分学生聚会

这次回乡探亲，从固原到银川，我和原预旺中学十多位昔日的学生见面叙旧。

在固原，学生马吉福半夜接站并于翌日和夫人带我们观看固原新貌，老城新区均转了一大圈。固原由专署改市已几年，基本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大有改观。明代所建的城墙有几处保存完好；老城内开发得差不多了，又向城外发展，修了一条据说50年都不落后的五车道公路，征了两边大片农田，计划把党政机关均搬到城外，建设新城区。而吉福也由固原地委宣传部一名科长晋升为市局级干部，相当于我的顶头上司了。

学生张玉华在银川一中任教，5月3日那天，她做手术出院才十几天，医生叮嘱她要静卧休息，但她两次到饭店聚会；在甘肃省环县工作的刘月明，驱车数百公里来银；拓维霞和张秉俊夫妇由吴忠市赶来；任宁夏经济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忠玉，从北京出差1回来即请我们吃饭，并邀集原预中朱老师以及季栋梁等几位同学作陪。当年稚嫩清纯的男女少年，贫困清寒的农村学子，如今也都做了父亲母亲。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再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让女士们衣衫称身，容光焕发；男生们身强体健，风流倜傥。大家感叹时光的飞逝，社会的变迁。我既为学生们的成长高兴，也不由得暗自神伤：那时的我正如他们现在的年纪，却哪里有如他们的风采？清贫自守，束手缚脚，生怕一招不慎，祸从天降。转眼间韶华逝去，残酷的岁月铸就了一个花甲老妪。

席间，谈得最多的还是对中学时代的回顾。张玉华回忆，我曾讲她有次作文写得不如刘月明，并批评她胸无大志；马忠玉说：“魏老师曾警告我：‘你不好好学习，还想考大学？’”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也感到抱歉。当老师的，讲话可是要谨慎，决不能伤了学生的自尊心，也要防着他们“秋后算帐”噢。

1 他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并获得西北农业大学生态经济与资源管理博士学位，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是中国农科院的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让人痛心的是，2020年8月，他在任国家信息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期间，因涉嫌受贿被“双开”。

杜建录、杨占武一届的9位男女学生，有的已在银川小学、中学、大学也“成了你”（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词，意即“也做了教师”），肩负着教学和管理的重任，他们是：在银川唐徕渠小学的刘学宁，在银川五中的刘玉琴，任宁化子弟学校副校长的胡彦存，在唐徕中学任教的周广仁，任宁大西夏研究所所长的杜建录；其他人有的从政：赵世华是区农林厅副厅长，吕继明是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副处长，郑强是银川市教育局纪委书记。杨占武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后，曾在区党委办公厅工作。现已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担任了区党委副书记²。

5月3日下午聚会时，杨占武说：“我们给江老师打电话吧！”手机拨通后，我向之浒介绍了当时热闹感人的场面，然后学生们一个个和江老师通话，追忆往昔生活。吕继明最逗，对着手机喊：“江老师，你常骂我，‘吕继明，你这个老油条！’”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电话那头是怎么应对的呢。往昔的小毛头们现正年富力强，个个事业有成，神采飞扬。他们对老师如此真挚深切的怀念之情，直感动得我三十岁的二儿子哽咽流泪，反躬自问。我也感受到了学生的敬重。这种敬重，没有功利，只是爱和感恩。

杨占武又给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正伟（后任主席）3打电话，告诉他魏老师已到银川。王正伟当即让占武转告我，他明天上午到杜建录家来看我。

第二天早饭后，四妹灵芝和妹夫建录带我们参观母校新貌。现在的宁大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的老建筑只剩下了当年叫“拐角楼”的红楼；设备齐全、宽敞明亮、装潢精致的住宅楼早已取代了那些简陋狭小的筒子楼；笔直宽阔的水泥道路四通八达；以新主楼为代表的一幢幢形态各异、高耸挺拔的楼宇掩映在绿树丛中；漂亮的飞跃广场被清澈的湖水三面拱卫着，显得湿润而温馨。而我记忆中的校园，是满目荒滩和沙丘，哪来的水啊！然而如今校园内听说有三个湖泊呢。

快10点时，杨占武、赵世华和宁大一位副校长撒承贤陪王正伟来到建录家。31年后师生相见，我们互相热情地问候和握手，无拘无束地忆旧。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江老师”：他坎坷的经历，他在同心所经受的苦难，他的仁慈和敬业，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他们感念师恩，情真意切。我一再说明，正如江老师所言，一个老师只教一门课，当年你们能考上大学，首先是自己的天赋和立志拼搏的结果。

这之前，在银工作的十几位同学聚餐，欢迎我这个几十年不见的学友。他们是：张衍芸、张迎胜、刘金明、罗北雁、李宗耀、何光汉、何炳业、蒋余良、马学恭、权振声、刘鸿娟、张根发、葛淑君、张国宁、乔俊峰、张耀⁴等。往昔的

2 后任银川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宁夏社科联副主席、主席等职。

3 王正伟是我在同心王团中学时的学生，他在同心中学读高中时，之浒也教过他的课。他后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

4 因事未到，电话叙谈。

“八九点钟太阳”，如今似夕阳般两鬓染霜，退休或即将退休。当年因缘际会成为同窗，却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相互心存戒备，疏于交流；这会儿聚散匆匆，不免争分夺秒，述说别情。我后来又与郭爱珍、雷端枝、季生贵、周新夏、王尽忠等打电话叙旧述新，不亦乐乎。张衍芸和我近年来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着联系；2008年9月，何光汉由沪来淮，我得以借机询问各位同学的大致经历。2015年，老郭（自称“老玉米”）和小张（爱珍与衍芸，女童鞋中年纪最大和最小的两位。）发起，鸿娟同我响应，手机微信中出现了“夕阳红”朋友圈，发照片，传信息，大家的联系更密切了。

可惜可叹的是，已有几位同学先后因病离世，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

60.一 “书” 激起千重浪

2003年，之浒着手写他的回忆录。期间，我发现他常常写着写着就悲从中来，饮泣吞声；激愤时会握拳砸桌。其实，早在写《苦难往事堪回首》（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6级13班班史《那时我们多年轻》一书撰稿）时，他就多次为过去所受的苦难悲切流泪。结婚这么多年来，我对他的经历的了解由少到多，自以为可以平心静气看待这一切，没想到，从这篇文章，更从他的《夜阑，涛声依旧——江之浒回忆录》里，我才算系统而深刻地明了他十多年惨痛的“右派”遭遇，感同身受，愤慨不已！我们的儿子、媳妇们更觉震惊！我们知道了，他所经历的，首先是政治上的打击与迫害。反右运动，一个有预谋（所谓“阳谋”）的整治知识人的政治事件，是家国一段至黑至暗的历史时期！接着是在和平时代、并无大的灾害的年景，致数千万人成为饿殍的三年大饥荒和整整十年劳动改造的折磨。对于九死一生的江之浒来说，吃这回忆的“二茬苦”，堪比经受“凌迟”之刑！

最早评价之浒回忆录的是旅美华人作家张方晦。2007年5月，他在《遗忘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推荐江之浒回忆录》一文中写道：“江之浒先生不是社会名流，亦非哪个领域的耀眼明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不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现在他已年过七旬了，他的人生也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辉煌了。但是，他却有着非常不平凡的经历，非常屈辱非常艰难困苦的前半生。他把那一切写了下来，写出了他个人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这样，他的生命在一定的意义上就发出了光彩，能够照亮很多很多后人的心灵和眼睛。很多年来中国的人民被劝导着要“朝前看”。是呀，当然是要朝前看。因为我们总是在朝前走。但是，在朝前看的同时，我们又岂能失忆？对于我们曾经受过的苦难，岂能忘得精光？这种苦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妄之灾，而是专制政体恶意地施加给善良正直百姓的严重迫害。我们在朝前看的同时，一定也要频频向后瞻顾。否则就是忘记历史教训，颠预不辨是非。江先生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他代表着五十多万名跟他同命运的无辜者。这就是一个广阔的社会现象，一个不容糊糊过去尘封起来的历史创伤。

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加上科技的高速发展，下一代的青年很容易在各种新潮流的冲击下目迷神眩。他们已经不知道父辈祖辈是怎样活过来的，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已经不想知道。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危机。正如作者和序者在引文中所指出的，遗忘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前途的民族。江先生回忆录的可贵在于它的真诚和实在。只有真诚和实在的文字才有史料的价值和感人的力量”。（《多维新闻》2007年5月5日刊载。）

之浒的二姐江一清在2007年12月6日的电邮中说：

“浒淑弟：电子邮件已收到。您的书现在在我的三女儿陈凡家，她感到写得非常好，二女儿陈路想看，但陈凡老不还回来，我在京有位世交即李则茂伯家女儿李昌荣（其父是父亲结拜兄弟，在台受他家照顾），她的丈夫王景山是师范学院语文教授，我们每年聚一次，我本想将您的书给他看看，但书一直回不到我手上来。”

我的父兄弟姐妹、之浒的侄女江匀匀、南通大姐、淮安三姐的孩子们，都争相阅读这本书，父兄不寒而栗，年轻人则认为这本回忆录让他们了解了社会生活的复杂和残酷，知道姐夫、舅舅一生的不易与坚守。

不光是我们这些亲人。2007年5月，我们从美国返回后，将带回来的回忆录分寄给之浒当年的一些同窗和同事，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震撼，叹息，反思，以及质询的意见。且看：我们的友人江汗青先生于2007年5月28日的来信中说：“反右五十年，国内是不能出这方面的书的，你有幸在大洋彼岸出书，也是那帮人没办法的事。在信息时代，还要搞封锁，只能适得其反。我祝你们夫妇的成功。”“我是努力地生活，希望能多活些年，看看究竟这世界，这中国会变成啥子样子。”

我们的学生马吉福于2007.6.3星期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收到江之浒老师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书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约三十万言，回忆了他七十多年的历史。时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止于二十一世纪初；空间从江苏南通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到宁夏同心县，到法国记者所关注的《马艳日记》中的豫旺中学，再到淮阴市，到美国。作品当然不仅仅记录了他个人的时空变换，而且以丰富的史料，真实而生动地讲述了他在封闭与开放的中国社会的种种际遇和所思所想。其个人的命运也是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遭遇，也有机遇。机遇成为遭遇的条件，遭遇又成为机遇的基础。遭遇是坎坷，是被错划为“右派”的经历；机遇是坦途，是做了北大、人大的学生和“改正”后的人生。遭遇和机遇各二十多年，机遇实现了人生意义，遭遇决定了人生价值。可以聊以自慰的不仅仅是中年以后的时来运转，而且更有一批学生和三个孩子的成才。”

“江之浒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确有些共同经历的，包括对事件和环境的经历。比如除了他和我共同相处过的豫旺中学，他的出生地江苏、就学的北京以及退休后游历美国的体会。所以，看他的回忆录，就更加的熟悉而亲切。

江老师是我高中两年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是他被“逼上”豫旺中学后所教的首批学生之一，所带班级的班长。……上高一时我本来是想学“红医”以便毕业后当个赤脚医生的，但开学了，据说从县城调来一位要给普通班当班主任的老师还没有到，为了这个班有人管理，校方就动员我上普通班，并让我代行了一段班

主任职责，他到任后就做了我的班主任，我与江老师由此就有了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师生关系，但更有很深的个人情谊，这情谊就是在一个特定环境和一段特殊的历史中凝成的感情，这感情的基础就是真和善的品格，就是在被过分的压抑中对知识，对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尽管豫旺也是有些人文历史，历史上也堪称米粮川的，但现实的豫旺就有些无比的荒凉饥苦了，即使在地球最美丽的盛夏，即使是一名“公家人”，在这里往往也喝不到一口甘甜的清水，吃不到一颗新鲜的蔬菜。所以，豫旺对于江之浒老师一生所经历的环境来说可谓是谷底所在，但豫旺确是我生命的第一故乡。对于豫旺，我们都有些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感情在里面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尽管我们的阅历不同，但他由于政治的原因，我由于自然的原因，在同一个干旱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里相遇，我们都有一些彼此尊重、理解、同情对方不幸命运的心境的。他也许为我等的生于斯、长于斯而悲悯，而我却为他能职于斯、安于斯而费解。而且这心境一直保存下来，间或回味起来，也颇有些复杂的情愫生发出来的，看了他的回忆录，方得一些释惑：‘这是个全面受到控制的社会，且不说政治问题，就是户口、粮食关系、票证等生活问题，也足以让任何一个志存高远的人都顺从而“相机行事”的。’

“但是，人生的辩证法总是这样——祸兮福所倚。人都说，苦难是一笔财富。但是，在苦难中苦难还是绝对的苦难，只有在苦尽甜来以后，苦难才可以变成财富，比如这《夜阑，涛声依旧》就是一笔财富，这财富却是以几十年的苦难为成本的，它堪称新中国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的鲜活史料。他的被贬到同心县乃至豫旺中学，之于他本人是一种厄运，但于两个人却是福祉：一个是他的妻子魏老师，她是隆德县人，在同心中学教书，她因了遇到他而互结同心并养育了优秀的孩子；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学生都是贫苦农家子弟，学生因了他的到来而有了知识并改变了命运。江老师和魏老师的孩子现在都在北美发展，事业有成；他们的学生中现在有官做至省部级的，学者做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命运多舛而致使更多人改变了命运，实现了人生价值，岂不是更大的人生意义！只是这样说说容易，但由具体的人来承担就有些痛苦在里面的。……不过，人总是在跟人比而又不能跟人比的。与交了好运的同学比而生遗憾甚至愤慨，与共同的遭遇中已经被枪杀的同学比，却也会生产万分幸运的感觉的吧。”

吉福的日记后来以《夜阑，涛声依旧》为题发表在他的大著《幸福与痛苦的人生》中，其中有两段本书在第29节中亦有引用。

之浒在读了高足的评述后，异常动情，于2007年9月1日给吉福回了封电邮：

吉福：

小泓转来你的“读后感”。谢谢你对此书的评价。真想不到我这个“班主任”竟也在政治上连累了你，可见这古老中国的国粹“连坐制”也如此长盛不衰。你的憨厚、你的朴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知道你是我当班主任的“合作伙伴”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的“合作”，证明我们俩的师生关系是和谐的。在那样严酷的政治气氛中，你能正确地对待我，这是要有勇气的。那种政治上的“诱惑”，不要说对不涉世事的青年人，即使那些成年人都抵挡不住。那时，去伤害、残害一个右派不需要付出丝毫成本，就可拿到党票，就可有“锦绣前程”。

这些事例实在多了去了。可以这么说，我们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我十分珍惜。

在“读后感”中，我似乎找到了“知音”。因为我的一些数十年一以贯之的理念，你读懂了，你理解了，这是基于你是黄土地农民的儿子，深知民间疾苦，基于你见识了西方(含澳、新，美利坚)，开阔了眼界。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过他们的 party，有一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叹。

我的这本回忆录有血和泪。这就不是每一个“写家”都可信手写成的。数十年的青春年华、难以回首的人世间的精神折磨换来这本书。它像一小股溪流汇入人类文明史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它的价值。我的二姐说此书写得“很好”。前些天，我分别接到了来自广东的、我的同心中学同事周昭亮先生的孪生女儿的两个电话，她们都说是“流着眼泪看完这本书”的，我的在江苏南通的外甥女说是边哭边看这本书的。在武汉的侄女鼓励我，希望我再多写点。我并不认为这本才出版半年(已出版发行第二版，改正了少量的错别字、漏字和标点符号)的书就会好评如潮。它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胡乱写来，不成章法，还请 局座指正(一笑)。即请秋安。挽淑和我请你代我们向

马丽女士问好！

之浒 2007.9.1

“书收到，‘挑’灯夜读，人和事，过程境遇，试曾相识，亦深有同感。那是一部人生苦旅，劫后余生记。”(之浒南通农校校友柏秋圃，时为河南农业大学教授，2007.9.28.)

“当初读你的《苦难往事堪回首》，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感动了，你受的苦，是一般人无从想象的，但我能够想象，因为我是甘肃人。我们甘肃的劳改营夹皮沟，比你那里更惨。九死一生，几千名右派活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夹皮沟的真相才逐渐被揭露出来。”(李思孝，之浒北大同学，北大教授，2008.1.26.来信)

“阅读尊著，我几乎花上两天时间，反复斟酌、琢磨、推敲，如痴如醉，夜间展转反侧，难以成眠。《夜阑，涛声依旧》引起我的共鸣，它深深震撼了我。……有志者事竟成。弃农从文，君之夙愿。跌宕起伏的人生，虽九死而无悔……最令我诧异处，在于故纸堆里资料之系统、完整、原始……”(之浒旧友唐景欧 2009年3月4日来信)”

“自得到大作喜不自胜，如饥似渴先粗读一遍，后选细读感兴趣的部分，共花三天时间，什么家务都不干地看……你的此书保存了当年作为右派劳动时的书信摘要，有先见之明，这是反右运动第一手材料，为后人作‘正史’的绝好参考资料。”

“你受的委屈和劳动的艰辛可谓一字一泪，不过也学了不少人类生存的知识……”

(以上两段摘自之浒考大学时的同事、朋友、辽宁大学副教授汤大不同于 2011年11月4日的来信)

作者的大学同学也争相排队阅读之浒的回忆录。宁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学妹张衍芸在2007年5月26日的电邮中写道：“我们虽尚未来得及全部细读回忆录，但已深感其分量之厚重。它既是江先生不凡人生历程的实录，又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珍贵而深刻的记忆。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是不言而喻的。书中的文字和照片，也让我们再次走近了老友一家。虽经坎坷而晚景欣然，是令人欣慰的。”

另，江先生大作中写及的同学钱理群（似是书中毕业照中，第一排右起第3者？），该是如今北大同名的著名学者吧，著述不少。记得他在《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一文中，曾提出了“建立‘1957年学’”的倡议，日后又发表过《〈“1957年学”研究笔记〉前言》（2003年）。不知你们与钱先生有联系否？”

何止我们的至爱亲朋，当年无数次批判斗争他，以繁重劳动虐待惩罚他的同窗、同事，也都没能无动于衷！

“书我立即看了，差不多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虽然读过你的那篇《苦难往事堪回首》，印象很深，但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仍使我感到震撼。你所经历的苦难，让我深感痛心！同时，我也佩服你的坚强和应对苦难的智慧。……如今我们都老了，……回忆往事，不仅沉重而且困难。你能写出这么一本《回忆录》，只这勇气就令人叹服。”（之浒北大同班同学阎焕东，时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2008年1月25日的来信）。

很明显，一本书之所以掀起波澜，是因为其中揭示了江之浒十六年独特的、非人的“右派”经历。

这经历可分为北大右派学生生活与发配至宁夏劳动改造两个阶段。在本书第28节中，已经介绍过他于宁夏同心县劳动改造的部分实况，这里，补充叙述他在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遭遇。

在1956年7月的全国统一高考中，江之浒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这是他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的第一个学校，他的开心和喜悦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南通农业学校毕业，又有四年艰苦治蝗经历的他，因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其实他们家没有土地），就连报考大学的机会也来之不易，是经过一番抗争才获得批准的。

之浒曾多次述说过，当时，申请报考大学的其他同事都获得单位的批准，唯独他迟迟得不到结果。无奈，他下决心去找扬州专署副专员陈超，“请陈专员支持我报考大学！”陈在耐心地听了他的申诉后，非常干脆地表态：“我完全支持你，我将派人了解一下，再告诉你！”翌日，单位就同意他报考大学了（江之浒1956年4月19日日记）。之浒一直感念陈超先生的好，当得知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后，深表惋惜。

然而，在北大读书的第二年，受“大鸣大放，积极帮助党整风”的舆论号召，全校师生热情投入运动。从1957年的5月19日开始，只几天功夫，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大辩论也风起云涌。江之浒与班上两位同学，合写了一篇名为《呐喊》的大字报，为受左派围攻的谭天荣、张元勋等先行张贴大字报的校友助威。他又给在西北农学院读书的好友吕庆仕写了两封信，讲述北大的鸣放盛况。这下，他创下大祸。5个月后便“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从此，这个年仅 22 岁的热血青年，一下子失去了政治自由，成了敌人和专政对象，必须无休止地交代“罪行”，并接受同窗们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虽然宣布给他的处分是留校察看，但在严厉的群众监督改造中，他已受到苛刻而残酷的对待。

在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检查、检讨和批判、斗争的形式，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极权专制现象。我看到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本笔记，大都是他被迫检查交代家庭出身和“反动父亲”的罪行及对自己的影响。其实，他父亲去台湾时，他才 14 岁，能受到多少影响？再就是检查交代自个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记录一次次批斗会上（反右、社教和文革时）同学、同事揭发批判他的发言内容。不记还不行。不记，就是不老实接受批判，消极对抗。

之浒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了 1957 年反右运动中班上的两次批斗大会的发言记录。

有趣的是，这引起了他当年的一些同学、同事等读者的强烈反响。

2011 年 2 月 15 日，从辽宁省鞍山日报社退休的之浒原北大同学朱劲干，由鞍山市打来电话，专门向老同学“表示道歉”。他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为了表态，为了自保，发言伤害了你，对不起！”这是至今唯一的一位明确向之浒道歉的同学。

北大教授钱理群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急就”了《示众一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一文（该文发表在《随笔》杂志 2008 年第二期第 156 页）。

他在文中写道：“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

他诘问自己：“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 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 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钱先生在文章中还写道：“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发言？此刻，我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

钱先生回顾自己当年两次发言的历史背景和初衷后说：“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钱先生认为，“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他说：“健康、

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撑着体制。”

他告诫读者：“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像 1957 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钱理群后来还精选他近年来的包括《示众》在内的十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集结为《知识分子丛书—示众》一书，足见其对此文的喜爱与重视。网上有评论说：“钱理群先生作为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学者，不仅仅时时关注社会的疾苦，为身处低层却坚毅地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所感动，而且以《示众》为题反省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把自己作为案例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者的关怀、感慨、反思均字字见真情，富有感染力。”

网上还有位名为“豪情依然唱大江”的网友在其个人天涯博客如下网址 <http://blog.tianya.cn/listdate-222409-2513516-2.shtml> 上发文《半个世纪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其中评论道：

钱理群教授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他在 51 年前那场“反右”斗争中就拼命“积极表现”，很有水平地对他们单位（北大）的右派分子江之浒进行了批驳。现在，江之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了钱对他的批判。钱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示众》，把自己两次批判会议上的发言公开出来，坦承自己扮演了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最感兴趣的是，钱理群当时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的批判。

钱先生当时的批判如下：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的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分子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 年，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几乎是我们多年来常批常新的话题。就是近两年，我们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批判。遗憾的是，半个世纪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批判至今好像也没有什么新词，还是拿钱理群那些东西“捣粪”——水平稍差一点的还讲不到钱先生的高度。新闻自诩“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俗语却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原地踏步不知究竟踏到什么时候？ 日志日期：2008-3-16 星期日

（经考证，该网友应是刘桂茂先生。刘先生 1948 年出生，高级编辑，著名作家、文艺评

论家、当代杂文大家，原河北《沧州日报》和《沧州晚报》总编辑，现任沧州记者协会主席。为河北新闻史上唯一长期兼任两报总编的资深报人。

<http://www.huanghua.gov.cn/html/200701/16/163334614.htm>)

由于钱先生至今未与他的老同学有过任何联系（大概在 2008 年秋天，应北京一位同钱、江均熟悉的朋友的提醒，之浒寄给钱理群一本自己的回忆录。钱却一直未有回音。虽然，之浒于 1997 年在北京打工时，他们一帮老同学聚会，钱也在内，且说是专为来看江之浒的。）我认为，钱急急忙忙发表《示众》一文，是他作为知名人物，给社会公众的一个交代。假如他是真心反省，就会借收到书打电话道歉，起码和同窗有个联系聊聊天啊。

巧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并非我一人。我们的学生马吉福就抱持很有意思的看法。他在一封来信中写道：

“哈哈！我读了钱理群的《示众》，本然的就产生了哈哈的感想！还是看到了他拐弯抹角的解释：当年为了讨好、表现、保存自己，为了使自己逃过一劫，才陷自己的同窗于万丈深渊！这是当时的心态，现在看起来可怜而又可恶。那么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他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从《示众》里还是看到了一个人一生的作为，只有性格或本性的放大，而没有本质的改变。他依然是一副激进的神态，要“拒绝遗忘”，要把人性恶的一面“示众”，是痛改前非的架势。但最后归因于什么呢？社会，体制。是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摆脱不了社会制度的蹂躏的，比如《悲惨世界》中的嘎西默多和冉阿让，《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还有我国“反右”运动中的“右派”。但是，同样是在这些社会环境中，为什么一些人总是被蹂躏，一些人为什么又蹂躏别人呢？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甚至同样是“出身”有问题的条件，为什么人与人就不同，一些人固守着善而另一些人却仅仅表现出恶呢？是的，人性善，人性也恶，善与恶是人性的两面性，按照钱老的观点，善在好的社会与体制中表现出来，得到高扬；恶从坏的社会体制中表现出来，得以横行。这也不无道理，但似乎也不是道理的全部。人性除了要受到社会的驱使，难道不受人性包括立场、观点、修养、观念等等主观的指使？照钱老的意思，现在俨然是好社会好体制了，但现实社会体制中就完全是菩萨吗？哈哈！吉福偏见，供江老师一笑。2008.4.3”

不得不说，马吉福所见非但不偏，且高且有远见。后来的事实证明，钱教授因发表“北大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言论而更出名，但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所谓创立“五七年说”，并非真正认错，实则是吃现代的人血馒头——踩着右派的血泪之躯给自己捞得一项反思的桂冠！他真正反思自己了吗？且看下文，我这里只转述网上阅读到的其他事务评论信息。

“我想国内文化教育界很多人士应该知道，本世纪前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少有的原创性的文化巨著。暂不表《灾变论》的悲惨而奇异的经历，单说“新语文运动”，其发起人任不寐先生就遭遇了一场鲜为人知的联合谋杀。”

用《『新语文读本』背后的传奇故事》（2013-09-14-08:48:05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一文作者老田的话说：“首先是无行的中国文人和商人的苟合，然后是两种人和两个‘政治团伙’的苟合，最后是这三种势力和乌和之众的苟合。这些势力恰恰就是多年来妖魔化+++（指任不寐）的始作俑者和推波者。很多人希望+++”

彻底消失。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地自动消失，就用国家机器和市井流言逼迫他消失。但是，谁能清除已经存在的事实呢？”

事实是：“任不寐发起的这场新语文运动，最早是三方协议，投资方邓良平，编委会钱理群，总策划任不寐——任不寐在新语文读本中拥有一定比例的版权或股权。后来邓良平和钱理群背着任不寐，单方面和广西教育出版社签署了新语文读本的转让协议，根本不提任不寐的权益，实际上将任不寐的权益缩小为零，从此新语文与任不寐无关。

由于‘顾全大局’等等原因，这件丑闻一直被掩盖到今天。任不寐一个策划救活了一个出版社，并富裕了编委会，祝福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孩子，但他自己，已经被彻底遗忘。人性的邪恶不止如此，钱主流连同其他主流，怂恿他的学生们，开始了近十年对任不寐的妖魔化。背后阴谋和咄咄怪事，也涉及官方的推手和对网络地操纵，到第十个年头，才慢慢浮出水面。”（此段为网友“光头时代”2014-02-03 18:05-13 跟贴回复）

（国内时政论坛“猫眼看人”上的这篇转载文章连同评论或许因为触及“敏感词”原因被删光了，如果要查看全文，网站“不寐之夜”还有其原初版本，文章标题为：《任不寐三部作品的灾变命运》。）

我虽读过任先生的文章，近年又常看任牧师的网络讲道视频，但与他无任何联系。转推此文只想让人们认识钱的伪善本质。一一贯之的手段，甚而有过之无不及！我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不是主流观点。但我觉得殊不为过。要认清一个人，只有与之有过交接，才可看到他的本色（包括心胸）。我更不是论断他，因为只有神有权柄论断人。神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学着分辨真理，分别为圣，尽可能趁着光行走，信从这光，使自己成为光明之子。

2020年6月25日，当我与吉福重新聊起这事时，吉福说：对，这个观点现在依然坚持。今天又读了他的“示众”，依然产生的是这样的质疑。而且我的质疑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基于钱先生辩解的不符合逻辑上的。他并且叹息：关键在于看透的人白看透，深受其害也无奈，“有奈”的人则保持不看透，甚至需要“奴才”（钱理群语）。这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左右逢源、大行其“道”的根据。这也可以解释钱先生把自己的选择归于制度和体制的原因。

江之浒生前没有看到以上几段文字。

当年之浒认为，钱能这样做已经不错了，他的反省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之浒在给马吉福的回信中写道：“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像你这样性子坦然的人都要怒发冲冠，可见‘不平’之程度！不过事情已然如此，我劝你肚量放大些。顺势而为。人生苦短，力求过好每一天。前些年，我在网上看到无法无天的事情，也由不得自己，拍案怒骂，后来仔细想想也大可不必，太伤神，且又于事无补。”

在这一点上，我们老友江汗青先生也抱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钱理群这个人直到现在在有些地方还是糊涂的，我记不起来了究竟在哪里见到过他的一点什么言论。但在现在北大的人们中还算十分不错的。在反思反右的问题上，像他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现如今能作这样反思的人太少太少。近年遇见的人中，凡说到各次运动，都说自己受到了迫害云云，就见不到一个人说他在运动中整过人。中国人呀！就没有多少人有忏悔的意思。也许是我们社会缺少基督教精

神吧！”（2008/4/1）

尽管如此，之浒的心境并不一直都是波澜不惊的。他北京有位朋友，曾与钱理群先生谈到之浒的回忆录。这位朋友写信告知了此事。之浒不知则已，知道了便气不打一处来。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您和钱的对话中有两处，钱说，对于我公布了班上批斗会发言记录，左派‘大怒’。这是必然的。也让他们尝尝当‘左派’的尴尬。历史总是要捉弄人的。在京打工两年，在‘改正’后漫长的这二十多年，没有人向受伤害者道个歉的。有的还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津津乐道所谓‘教育革命’‘三面红旗’。这些‘左派’全都得了健忘症，这是国家、民族的悲哀。这就是这批所谓的国家精英（高干、教授）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收获’。有人给我来信（先向我索要回忆录），认为书中关于批斗会发言应让发言人核实，如确实需要发表由发言人通过自己的文章发表。一句话：封口！多霸道！此公就是焦国标过去的领导（中国文化报前副总编）。我至今未理睬他。

当年政治上的分野，导致数十年后的‘差距’。有人住在二环三环以内的价值百万以上的住宅内，有人住进朱毅先生承租的十八层楼下的，为打工仔准备的‘翡翠宫’。有人也许早已进入地狱。牢骚太盛防肠断，就此打住。”（2009.2.2.）

那位“前副总编”就是之浒同学阎焕东先生。

阎焕东先生对公开批斗会上的发言有他的看法。他在上述来信中写道，当年，“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站在背后，支配一切。”继而，他说：“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有受过挫折—包括政治上的迫害和打击”。他说自己虽然属于“根红苗正”的一类，却也在“文革”中受过围攻，挨过打，甚至曾被抓到公安部去。“其他同学的经历更是五花八门，总之人人都经历过凄风苦雨。”

“关于那篇批斗会记录。……你说它是‘从故纸堆里偶然翻检出来的，’其本身的真实性自然无可怀疑；但它所记录的‘批斗会’的发言与现场的实际情况可能要有距离，其准确性需经过核对。因为，一，记录不是录音，不可能‘有闻必录’，从说话与书写的速度来说，能记下三分之一就不错了。那么其它三分之二呢？必然有省略、遗漏与综合，因而不可能是原貌（之浒笑言：如果当时我有录音机并且允许我录音的话，现在把那些发言一字不差地公布出来，就怕阎焕东们消受不起啊！—作者插入）。二，既然有省略与综合，就难免要有主观的东西……三，在通常情况下，为避免记录失实，或者说为使记录与发言者的本意相符，凡正式的或准备拿出来发表或作为证据的记录，一般都要经过发言者本人过目和认可，或作必要的订正；而且，在发言者本人健在的情况下，公开这些记录，一般要经过发言者本人同意，或者最好由发言者本人首先发表，一这似乎也是当今社会的公例，在法制完善的条件下尤其不能忽视的。我还想说，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核实材料，对历史负责，而且也体现了同学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阎先生不愧是国家文化部司法部门的领导者，写信也如同做报告，条分缕析，面面俱到。只可惜有握手电筒之嫌。维护宪法权威，依法办事，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可是，反右时搞批判斗争，依法凭据了没有？那时狂轰滥炸，大帽子满天飞，仅凭一张大字报，一封私人信件，就能定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名，发配到边远荒僻之地，让你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最残酷的

劳动改造，蹉跎岁月，耗费青春。数十年后说是扩大化了，搞错了，发一纸通知书就算“改正”了。没有人出来认错，没有谁来承担责任，组织上也不追究任何人的过错，没有道歉，不给赔偿（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不是一点点，那是好几十年的亏欠。地狱般的处境，比监狱罪犯还差的待遇，猪狗不如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煎熬……许多人为此失去了生命！）阎副司长为什么不关心这些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改正右派给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多封公开信，要求彻底平反并公开认错道歉，赔偿损失。作为司法部门的干部，阎副司长有没有设法促使这些诉求的达成？这应该是你的职责所在吧！

阎先生在信中说：“经历过从 1960 到 1980 这二十年的真实人生，当年的‘批判者’应该说有所觉悟或悔悟。……经过不断的劫难和反思，当年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又恢复原形，回到‘同窗学友’的本位上来。”

在阎先生看来，聚会一下，照张像，就是“度尽劫波兄弟在”，大家的心又联系在了一起，就不要再回忆过去的事了，不用反思和追究责任了。（那是否说，尤其不能指名道姓揭别人的疮疤。我们这些人风风光光几十年，如今均为国家重要部门的头头脑脑，你书中公开人家以前的那些胡言乱语，这等同示众，让人情何以堪！）否则，就是“你心中的隔膜多了一些”，而其实“不必这样”。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心胸和眼界，也会反映在写作中，熟悉情况的人不难看出。”

拿五十年后的法律条文来要求写五十年前事情的人，悖理不说，其实也同样反映出阎先生的心胸和眼界。不是吗！他会首先发表当年自己的发言吗？对历史，对自个的所作所为，他有过反思吗？

怕自己孤陋寡闻，少见多怪，我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因为阎先生在信中说：“我觉得，当时尽管每人的状况不同，遭遇不同，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应该总结，应该反思，甚至应该忏悔或致歉，但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又是站在相同或相似的地位上。”

如果我们将阎焕东先生与钱理群先生做个比较，钱教授在《示众一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一文中，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反思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说那么做；而阎先生则主要归结为“这里应该有更深远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运动中，特别是到了后期，同窗学子鲜明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分成了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是这些人在那里‘斗争’；而其实，在他们背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看得见的（如各级党的领导）和看不见的（如‘理想’‘信念’等），不论你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每个人都不能不受它的支配。”

谁说不是呢？这么看来，要阎先生自己先发表他的发言恐怕不可能。

百度里显示，阎先生著作颇丰，在“网上书店—孔夫子旧书网”，满足默认搜索条件的有 161 件商品。其中有专著《斯大林的故事》、《我们的祖国》；专论《凤凰、女神及其他—郭沫若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合作）；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合作）等等作品在打包发售。不晓得其散文集中有否反思的文章？

反思不反思是个人的自由。回忆不回忆当年的事也是个人的自由。鉴于反右在历史上的影响，应该反思；为了国家不再黑暗，为了民族永不受难，更应该吸取教训！哪能以法律的名义堵人的嘴！

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同于 2008 年元月行文或写信，钱先生的文章在先，

阎先生于 11 天后打印信件，1 月 28 日寄出（邮戳上显示）。信中的签名都是打印的。若不是信封上有手书，之浒是真搞不清那信是何方神圣寄来的。（信中附有一幅书太白诗《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的字画，署名“旭初”，赠“之浒学友”。从阎先生的履历中查出，旭初，是阎先生的笔名。）但阎先生能够当面锣，对面鼓的写信直接交流，尽管有让人不认同的地方，但能够如此坦诚相见，不光他的老同学，连我这个作者也感到，这是“隔膜少一些”的表现。毕竟，在大寒过后，立春前夕的严冬中，身处京畿之地的阎先生，还能想起昔日受过难的外地同窗，不容易。

认识人总有个过程，一些人的作为也是逐渐表露的。我近年还看到有人把钱与余秋雨比较，认为余先生从不认错，与钱是一个上，一个下。但在我现在看来，钱更具欺骗性。包括江夫子在内的许多人对钱的好感就是这种欺骗的效应吧！

之浒被发配至宁夏同心县劳动改造的苦难经历，甚至感动了与他从未谋面的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何光汉就是其中之一位。他在读了《夜阑，涛声依旧——江之浒回忆录》后，于 2008 年 5 月 21 日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他收入自己的作品集《珍贵的记忆——光汉诗文集》一书，该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 2009 年出版）。信中写道：

“敬爱的之浒兄和挽淑学妹：

你们好！你们是否感到突然，怎么从未联系的人会给你们写信？这是因为上月我拜读了《夜阑，涛声依旧》这部大作后深受感动，对它的作者萌生敬意，觉得有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以前光听说挽淑嫁了一个右派同事，据说这个丈夫多才多艺，后来又听说两口子又调到江苏老家工作，别的更多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直到前年挽淑来银……同时也知道之浒写了部回忆录。从那时起，我就盼望能读到这部大作，何时能结识这位北大的才子，我的同行呢？

直到今年春天，我从张迎胜张衍芸夫妇处借得这部大作后，才满足了我这个愿望。我先是一口气通读了一遍；放置半个月后我又读了一遍，这次是认真地细读了，真可谓慢嚼细咽——我要好好地享用这顿精美的精神大餐。

我与之浒兄素昧平生，是你这部披肝沥胆、直言骨鲠，用血泪写成的力作，一下子把我拉进了你的心灵世界，亲近了你，了解了你，感到那么的熟悉与亲切。”

“你来宁夏正赶上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闹饥荒的日子。我那时在银川的一家药厂工作，对你书中关于饥饿的描写有切身的感受。1960 年底我父亲就惨死于甘肃河西走廊的玉门镇青山农场（1960 年 9 月为了‘净化’上海，政府将‘有问题’的人驱赶到大西北来，美其名为‘建设’大西北）。为了迁移母亲和两个年幼弟弟的户口来银川同我一起生活，我曾经自己去了那个地方。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谈。所以，我对你初到同心县王团庄在苦难中挣扎谋生的回忆，有切肤之痛的体会，当我读到‘我的整个髑骨和过去见过的人体骨骼标本中的毫无二致，多恐怖！’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接着，又读到：一个回族小姑娘站在你的窑门口眼巴巴地盯着马肉——那是你用锋利的藏刀从一匹死马身上解下的腿肉，你因风俗习惯的忌讳（回民不吃死去的畜禽），没敢给她，她回去后当晚就饿死了，次日黎明你目睹了入葬的情景。读到这里，我的心也跟你一样颤栗起来……之浒兄，我佩服你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谋

取生存的意志和本领，使自己能幸存下来；我也要感谢你在捣墩子当食堂管理员能秉公管理，使不断死人的势头得到遏制（那位区农垦局领导的大胆引荐功不可没），保住了不少乡亲的性命。”

针对之浒在搞小学教师函授工作时的兢兢业业，何先生感叹道：“之浒，你完全应该是良师中的一位，毫无愧色毫不逊色的一位；可是因为带着右派帽子，没有教书育人的权利，只有‘囚徒’般做苦工的义务。《九死一生的炼狱》这章，让我看得老泪纵横，有好几处因泪眼模糊，只得中断阅读。”

我们在宁夏同心中学教书时的同事周昭亮老师也是感慨唏嘘。他于2007年7月5日的来信中说：

“江郎坎坷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这是时代的悲哀，国家的不幸，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江郎把这一段令人痛恨、令人愤慨的部分历史记录下来，是有益的，其意义是很大的。……记住过去的灾难与创伤，记住‘前嫌’，不是‘要计前嫌’，秋后算账，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要厘清历史的是非错过，永远杜绝再犯以前的错过。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谓也。印度圣人甘地说：‘以眼还眼。则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江郎的书其初衷一定是‘以史为鉴’，还我公正，期待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公正、正义的社会。”

诚哉斯言！之浒在回忆录的《结束语》中说得明白：“整风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如今，这五十五万多（另有三百多万一说待证实）受难者中的至少50%以上已驾鹤西去，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了。幸存者之中，能写作的，有责任写下自己的经历，让年轻的一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认识到专制极权统治才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才是万恶之源！……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均富社会。”

说到反右运动中打出的右派的总数，之浒的老友汤大同在2019年12月初两次发微信说，复旦大学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告诉他，全国原先公布的右派总数中，不包括学生右派，所以学生右派并不在改正之列。即使当年得到一纸改正通知书，但此改正非彼改正。因为习政权已否定学生被打成右派是不对的，何需改正。之浒知道了这事后笑了笑，只觉无所谓了。他过去就曾说过：反正我这辈子“右”帽戴定了，摘帽后是“摘帽右派”，改正了又是“改正右派”。他回复老友：正如余英时教授所言，“右派”是一个光荣的名词。我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将来戴着这顶帽子去见上帝，天父也会是喜悦的。奉劝老友学习圣经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样你以后才可以进天堂，我们就能够继续在永生中谈天说地了。

2007年2月，《夜阑，涛声依旧——江之浒回忆录》于美国纽约出版。

此书已被美国、加拿大、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二十多所著名大学收藏。国内也有许多大中学校图书馆收藏，中国人民大学一些学院将此书指定为学生的阅读参考书目。